

《潮州歌册选》序

薛 汕

一九八二年二月间，北国春寒料峭，南乡春雨连绵，已经二十多年了，我不象知音的侯鸟，倒象一头斗败的困兽，返回故土。

我在旅途中，梦里双亲迎来了！直见到白发婆婆的婶母，热泪还没有干，哪有什么双亲？只有婶母的声音：“来了就好，这也是你的家！”我回来了，不该让婶母陪着撩红了眼睛。我安静下来，婶母在楼上翻箱倒篋地把一个抄本放在我面前：

《刘成美》！

这是潮州歌册，经过多少次巨大的浩劫，她老人家还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深藏着《刘成美》。她知道我是爱潮州歌册的，问了一句：

“为什么现在见不到歌册呢？”

这该怎么说呢？潮州歌册，连同木刻板早被烧毁了，到处找不到。我回答着：

“会见到的！”

五十年代，我曾写过一篇有关潮州歌册的散文。现在，不能缄默了。就写了个题目叫《薰陶》，寄给《汕头文艺》发表了。（见一九八三年二月号，略。）

怎么样才“会见到”呢？先是约汕头的朋友们选一部出来，那知道困难很多：一是当地找不到本子；二是编选起来，面临的问题又多：校点上的，如何保持潮州方言？如何用字？整理上的：如何对待封建礼教、神话迷信？如何去糟粕存精华？……一旦编排出版，必须考虑到全国读者能够加以欣赏，而懂潮州方言的读者不觉“走味”。

两个年头过去了。

关于潮州歌册，冲破沉寂的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，谭正璧、谭寻写了《木鱼书潮州歌叙录》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印出。这

的群众语言，借助戏拟和谐摹，“诗的夸张”的手法，于幽默中增强了作品的讽刺力量。你看：胖墩墩的矮个儿桑丘满口民谚，成语和格言，他形容自己的女儿“十五上下，已经长得象一支长矛，鲜嫩得象春天的早晨，劲儿大得象脚夫”。而疯颠颠的瘦高个子堂·吉訶德则认为自己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是绝代佳人，是娇美的公主：她的“眼睛是太阳，脸颊是玫瑰，嘴唇是珊瑚，牙齿是真珠……”，可实际上，她不过是一个乡下姑娘，长得象男

样，“身子粗粗壮壮，胸口还着长毛呢”。作者运用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，造成极不协调的对照，读起来令人哑然失笑，从而既讽刺了骑士小说的文风和它里面所描写的矫揉造作的爱情，又嘲笑了堂·吉訶德的脱实离际和无病呻吟，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性的讽刺效果。总之，群众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幽默语言，只要善于学习，勇于实践，幽默艺术是不难掌握的。

不仅把潮州歌册的读者扩大到全国范围,而且作为一笔丰富的祖国文学遗产,应该考虑继承的问题。一九八三年八月,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戏曲曲艺》卷出版了,其中有《潮州歌》条,又是一个促进,再不容忽视潮州歌册了。

事有巧遇,赵景深老师在上海将编加上眉批的《古代曲艺选集》,来信希望选南方,包括广东的一些优秀作品,以尚未普遍熟知的为最好,我即推荐潮州的《宋帝昺走国》、《吴忠恕》和广州的《雁翎媒》。不意三种都要了。我当即依所嘱眉批了。不久,告以《雁翎媒》单独出版,而《宋帝昺走国》和《吴忠恕》各选二、三回,字数有限,虽然有“说明”加以介绍情节,俾得接读,终觉不是办法,没有做到很好地介绍潮州歌册。

我出于这样一个想法,才决意就我们掌握的资料,其中比较优秀的加以考虑,整理一个选集。大体是如下的书目:

历史帝王题材:《宋帝昺走国》

民主革命题材:《吴忠恕》和《新中华革命军缘起》

审理公案题材:《海门案》和《水蛙记》

民间喜剧题材:《滴水记》和《冯长春》

民间悲剧题材:《双状元英台仔》

神话童话题材:《升仙图》

我要附带说明的:名篇《荔枝记》因已收编在另一部《陈三五娘的故事》,资料集中,就不再选;脍炙人口的《苏六娘》多方搜寻不到本子,只好放弃;还有《许友若》,写孙中山领导的饶平黄冈起义,也以没有本子而告缺如。即使这样,这个选集,足以代表不同的内容、形式和风格。

原来预定二月间脱稿,一旦着手,出

现了很多想不到的问题,逐步解决了,时间也就推迟了。现在略说此中的原因吧!

这些木刻本子,大多残落,歌句中掉字、毁字是很普遍的;已存的原刻,白字、错字也很多;还有潮州方言的用字,已用的,有些不可思议,例如“得桃”、“做年”……音义距离太远。这就须加正义,使能靠拢而会意传言,不能不费一番斟酌的功夫。

为此,特列了一个《潮州方言注释表》,且举例解释几句:

“逛儿”,原用“得桃”,可用“个予”,因不普遍,与流行简化字容易混淆,因此改用“踢踫”。

“怎么样呢”,原用“做年”,因用简词“怎呢”。

“家、屋”,原用“厝”,厝系停棺之所,意不符,因此改用“处”。

“妻子、老婆”,原“媼、妘”兼用,统一用“妘”。

“什么人,什么地方”,原用“值人、值处”,采用古义,用“底人、底处”。

“自己”,原用“胶己、交己”,改用“个己”。

“打雷”,原用“雷阵”,改用“雷同”。

这么做,是不是做得对,可以讨论,有待统一。但信比原来好了点,不至离意太远,使不懂潮州方言的,也能望文生义。

潮州已习惯了的用字用词,也须加分别,才能一看明确,都一一作了处理。例如:“准、允”、“请、且”、“欲、要”、“理、礼”……加以分开;“着”为“着、得”、“翁”为“翁、夫”……等二意,也加以分开;“礼仪、理宜”是不同意义,有写“理仪、礼宜”都改正统一了。至于潮州常用,可代以都懂的就改用了,例如“跋”

改“跌”、“天是”改“还是”、“擘”改“娶”……等等。

还有一些由于不得已而出现的,同一意思,用词贫乏常出现的,如形容“样儿”,就用“形藏”、“形骸”、“行藏”……;形容“张罗、原由、道理、说话”、就用“张递、因依、理宜、言陈”……等;同一意思,因抑韵而用字倒置的,如“当该、济周、细详、德积”……等,只好不改,暂且照旧,作为过去的语言得了。

我所收藏的木刻本子,不想在进行整理的中途,发现在三部缺页:是早就缺页还是只我自己的缺页?只好到处求借,最后还是在首都图书馆找到解决,加以补入。总的说来,没有减弱原来的风貌。

这个选集,不叫校订,而作为整理,出于如下事实:

一、校订、标点、编序……全部是重新安排,一改过去以韵文朗诵会意为主,代之以阅读欣赏为主。因此,按故事情节的发展,尽可能减少长龙不断现象,使段落分明,叙与人物说话眉目清楚,有回思的余地。

二、原来是四句一组,潮州音韵逢偶抑脚韵,排列与此相适应。现把这降为次要,以内容为第一义,即使因分段在排列上拆偶句,拆了韵,单句缺脚韵,也在所不惜。这一点,若是新创作,当可避免,既是传统的作品,无法避免也就罢了。

三、凡属侮辱性的语言,特别是两方对敌,非对方的口气而是作者所陈述的,一概正名,不用“盗贼”、“妖鬼”、“狼主”……一类的贬称,恢复原本的叫法,直称不动。这样,一句之间,不免字辞有所调整。

四、一般地说,封建说教,牵涉的面较广,只要没有太大的毒害,就少更动,如戒以三从四德,存在一夫多妻的现象……

等等。但是涉及封建迷信,又不是神话,得加分辨,加以清除;有些意在劝善,形象恶劣,也不容存在。既有所剔除、删节,就势必有所增添,略加陈敷,使之衔接,做到弥缝而不留痕迹。

五、劝善、宿命的论断以及类似的词句,系作者的意图,与故事无关,删去了,无伤大雅而更能显示作品的艺术力量。

每部书的情况各有不同,略加说明:

《宋帝昺走国》,写宋代恭宗命韩滔抵抗金兵,不意元兵入中原,帝昺逃潮州蹈海的故事。这是潮州歌册中,以写宋代为背景的十多部中最后的一部。一向最受欢迎,成为日常谈资,一提包公,一提杨宗保,……为宋代江山的存亡得失,几乎惊叹观止。但是,这么些作品,却是在清中叶以后才出现的,这就不是一个简单宫廷稗事或趣闻野史而已。应该指出,意在贬清代以思念明代,张民族正气,灭异族威风。至于写宋帝昺走国,却又另有所指,末代皇帝的灭亡表示什么呢?正是晚清的写照。因此,阅读这一部作品,须知“画外音”。对于文字,大体不动,仅除去玉英与南海清用法术部分,使用写实主义的方法,不因此有无稽之谈而有损原有的风格。

《吴忠恕》,写清咸丰四年(一八五四年)五月十五日,太平军的一部分,吴忠恕在潮州彩塘起义的故事。其中所记,与真实有些距离。这里着重的是实地记录,以讹传讹的有之,随意加添的有之,特意诅咒、侮辱为盗贼更是贯串到底,但作者很同情吴忠恕,还流露出对吴忠恕说些好听的话,也写出某些真象,因此,整理这一部作品,就是拂去蒙尘,让珍珠光辉夺目。在这个意义下,尽量把富有革命性、民主性的,加以保留;相对地把逢迎

阿谀“官府”的，痛斥为强盗的，凭空辱骂必败的一些反面的叙述和描写，加以删去、改造，使整个基调以为革命张目变而为宣扬民主革命，记录太平军曾有过这么一件轰轰烈烈的事。吴忠恕是最后失败牺牲了，历史的记录都是口诛笔伐，无以复加；但这一部书，却在纪念吴忠恕，人民为他写了光荣的别传。

《新中华革命缘起》，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故事。人物众多，也还突出孙中山与黎元洪，所记的，还缺乏一般的故事结构，使之曲折、婉转而富于情节，只可说是一篇传闻的新闻报道。它与真实的历史记载，还有很大的不同，特别对黎元洪，歌颂的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还无大碍，尚可见起义前后，参加的士兵及人民相从的一些活动。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虽然全书没有写完，也值得重视，再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页，有过这么一次成功了，但又是失败的记事篇章。全文除校正外，没有大更动。

《海门案》，写潮阳县海门杨牡丹恋姐夫林阿汤的故事。杨牡丹与林阿汤都坚持结婚缘，终于实现。作为审案，有别于一般的办法，不是屈打成招，就是代雪冤错，相反地用一根红绳，加以牵起，尽管告状的纠缠不休，仍加断合。作为办案，很有人情味，博得人们的喜欢。全文没有任何更动。

《水蛙记》，写清嘉庆时，泉州秀才詹典出洋，得安南王赠宝归被害的故事。没想到毒害的人竟是岳父及其子所为。詹妻告状，省官均受贿，一直晋京告御状，才得雪白，罪人伏法。这个故事可能是真实的，作者自然作了一些加工。其中詹妻得丈夫亡魂梦告，过于虚假，删改了。这个案得以找到线索而能突破的原因，出于小孩子天真“杀水蛙如杀人”一语，才能

逐步深入；同时写官场贪污纳贿，联同作弊，十分可怕，不论怎么说，也不论在什么时候，现实的意义很强。事情可大可小，叫人联想的地方尤多，不在行文本身，而在这一现象的可怕后果。

《滴水记》，写清代广东书生林书德，过秀才李廷丰家门，为其女玉兰在楼上浇花水所淋，以致一见相思患病，由姑母谋成姻缘的故事。主人翁在书中不见得怎么突出，而姑母与婢女夜香，却写得十分生动，姑母的行径，叫人担心，而后果化为一阵春风，县主所断，有情有理，别开生面而成喜剧。

《冯长春》，写浙江邓金府冯长春随父回乡，父病死途中，乃乔装为女，卖身作婢，竟因此连得二妻的故事。这个故事，可与“三言二拍”的类似情节媲美而又有自己的特色：曲折迂迴，奇峰突出，化险为夷，叫人拍案惊叹。读的听的，无不为此笑开肺腑，成为更上一层楼的喜剧。

《双状元英台仔》，这是梁山伯、祝英台故事的续篇。写祝英台的儿子梁承，被奸相一再陷害的故事。这一民间故事，在潮州不是一般所知道的：祝英台哭拜梁山伯坟而双双化蝶，而是梁、祝复活，梁山伯受命出征，祝英台的后代，继父志为王朝卖命，福建、台湾都是这样别致的写法，很有特点，全部是补偿人民对“梁祝”的同情与遗憾而起的，也满足人民对忠奸有别、好人应得善报的夙愿。《双状元英台仔》向来是“惨书”，明知不是真实的事，唱的听的还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为梁、祝的命运嗟叹；到了终极，借神的力量，压倒奸邪，扶持忠正而得以阖家团圆，皆大欢喜。为什么要梁、祝这么表现？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。这里特地予以介绍，也让其他地方的读者，一开眼界。由于梁、祝的故事，原是现实里的事情，也

评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

庄义青

同一营垒,两个派别

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清皇朝封建统治集团中两个政治派别,他们同属地主阶级,其经济地位和阶级立场是相同的。也就是说,维护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满清皇朝的统治是他们的共同的要求。但是,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开始打出“自强”旗号积极推行一系列“新政”时,立刻遭到顽固派猛烈的抨击和反对,双方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争论。了解这些争论的内容、性质和影响是研究洋务运动史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,它有助于深入认识和正确评价洋务运动。

三次论争,“朝堂水火”

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论争比较集中激烈的有三次,即同治六年的采西学之争,同治十三年筹海防之争,光绪六年

是人民对爱情、对忠奸看法的化身。所以,借用了“神仙法力”,所占的份量不多,是神话一类故事的余波,以想像来代替人力所做不到的事,但又希望成为现实的事,出于不得已而形成的手法。

《升仙图》,写汉时白猿、木猴、琵琶、狐狸四妖摄走太子珠辉在深山与女蜘蛛精订婚的故事。崔国舅女文姬学法后往救,大打一通,施法术始救出,与之成婚。珠辉登极为蜘蛛精立庙,文姬生子后归天,七十年后,又下凡一次,始升仙不再来了。

开始的建铁路之争。

同治六年(公元1867年),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訢等在创办北京同文馆的基础上奏准清廷,增设天文数学馆,招考正途科甲出身的人员,聘请外国教师讲授。这件事一经公布,顽固派官员即上书表示反对。首先是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要求取消科甲正途官员肄业;接着大学士理学家倭仁先后三次上奏折,从“立国之道”和有关“国体”的高度来否定这个“师事夷人”的措施;以后通政使于凌辰等人也上书附和。特别是候补知州杨廷熙,联系天象人事,提出“十不可解”全面攻击否定同文馆的设置和“采西学”的措施,把论争推向高潮,波及下层官员以至民间。这场论争延续时间约六个月,涉及此事的奏折共十五件,上谕五件。最后,同治皇帝以上谕的形式作出结论,申斥了杨廷熙、倭仁,维持总理衙门的原议,洋务派

这是一部中国型的神话、童话,其掺入历史宫廷的哀婉的事情,十分怪诞、离奇,但又叫人同情、愤恨、哀叹……给人在感情上的渲染是很深的,特别文姬归来,七十年后人事已非而自己并不察觉。生命如此可贵,但凡尘又如此无情与空漠,飘飘然就不如为仙归去。福兮祸兮,还留下悬念。这里介绍这么一篇,无非让人了解到,潮州歌册又多此一格,应该说,不争一花独开,而是百花争艳。全文中,动得最厉害的是把崔丹真游十八地狱中一大段,虽

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表面的胜利。

顽固派反对“采西学”“师夷人”，其主要理由是倭仁在奏折提出的“立国之道，尚礼义而不尚权谋；根本之图，在人心不在技艺，”^①也就是杨廷熙所说的“修德行政，实千古临御之经，尽人合天，乃百代强盛之本。自来奇技淫巧，衰世所为；杂霸驩虞，圣明无补。”^②这些“礼义”“人心”“德政”之类的东西，当然不是夷人所有，而是中国封建皇朝固有的“传家宝”。因而这一论点就成为所有的顽固派反对所有洋务新政的共同纲领。第二个重要论点是认为向西方学习就是“以夷变夏”。杨廷熙所谓“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，即使多材多艺层出不穷，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，尊卑之分不得定，名器之重不得不惜。”倭仁说“今复举聪明俊秀，国家所养而储以有用者，变而从夷，正气为之不申，邪氛因而弥炽，数年之后，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。”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第三是认为天朝上国，不需要向洋人学习。倭仁说“天下之大，不患无才。如以天文、算学必须学习，博采旁求，必有精其术者，何必夷人，何必师事洋人？”杨廷熙也称“夫以中国之大，养士之久，岂无一二知天文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之者哉？……何不令天下举而习之，而必自卑尊人，舍中国而师夷狄！”最新奇的莫过于杨廷熙的

名为劝人行善，但形象极其丑恶恐怖，暴露多于说教，又无实际价值，就加以删去了。至于神仙法术一类，是这个神话的组成部分，不论是四妖与蜘蛛精，无此难以成书，就保留不动了。

现在挖掘、整理潮州歌册的工作，仅仅开始。我们做的也许不得当，设若不对，就加以否定向前进！同志，“沉舟侧畔千

“天象示警”的观点。他把当时“自春及夏，久旱不雨，屡见阴霾蔽天，御河之水源竭，都中之疫厉行”等等灾害的产生都记在同文馆账上，说“此事实貽患之大者。”而且认为洋教师将会对中国学生“施以蛊毒”“饮以迷药”使人“终身昏聩，习其邪教”等等。顽固派的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引起一些共鸣。翁同和的日记有过如下记载：“（同治六年）二月十三日。同文馆之设，谣言甚多。有对联云：‘鬼计本多端，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；军机无远略，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。’”“二月廿四日。……京师口语藉藉，或粘纸于前门，以俚语笑骂‘胡闹胡闹，教人都从了天主教’云云。或作对句‘未同而言，斯文将丧。’又曰‘孔门弟子，鬼谷先生。’”^③对于顽固派的这些观点以及流言蜚语，洋务派都作了针锋相对的驳斥。洋务派的一个根本观点是“学期适用，事贵因时”^④也即从形势的需要出发，学习洋人长技，作为自强之基，反对空谈道义，无视实际。他们指出：“夷患之兴，匪伊朝夕，当年内外臣工，不求御制实际，徒以空言塞责，遂酿庚申之变。”揭发了“彼时兵临城下，烽焰烛天，京师危在旦夕，学士大夫非袖手旁观，即纷纷逃避”的事实，质问倭仁“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，自必别有良图……如别无良策，仅以忠信为甲冑，礼义帆过”，此之谓也。还有一句：

“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！

谨此以祝！当后，我可以把这本选集，送到婶母的眼前，让她高高兴兴地说一声：

“真的见到潮州歌册了”。

一九八四年七月二日，北京。